

内卷化与逆内卷化:流动人口 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

彭大松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2)

摘要:逆内卷化是指社会交往突破地缘、亲缘关系的局限,向陌生关系延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网络负载信息不断增加的过程。以往研究一致认为,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具有内卷化特征,交往网络局限于家人、亲属、同乡等熟人关系。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能力的提高,以及面临的都市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善为其扭转社会交往内卷化趋势、实现逆内卷化交往提供了可能。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变迁趋势,并比较乡-城和城-城两类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结果发现:与“60后”流动人口相比,“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仅部分具有内卷化倾向,而“70后”和“8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总体呈现出逆内卷化特征;“9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主要发生于乡-城流动人口之中,城-城流动人口不仅未出现内卷化特征,反而具有逆内卷化趋势。此外还发现,阶层地位较低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出现社会交往内卷化,而教育和家庭化流动对社会交往具有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在两类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年轻一代的乡-城流动人口交往内卷化预示着生活机会减少和不平等程度加深,应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逆内卷化;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C 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1)05-0112-12

一、问题的提出

“内卷化”的英文是 Involution,用于表达“由边缘向内卷曲、复杂的、纷繁的”等含义,它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归功于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的贡献。戈登威泽率先在文化研究中使用了内卷化一词,用以指称文化模式的某种发展态势——既无法稳定,也无法转变到新的形态,从而在内部不断复杂化的过程^[1]。后来,格尔茨(Geertz)在对印尼爪哇岛及岛外的农业生产进行比较时借用了内卷化概念,以此来强调农民不断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力而形成的

劳动密集型耕作方式^[2]。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时,也用内卷化一词来描述华北农村的小农经济发展态势,并将其内涵做了进一步延伸^[3]。此后,“内卷化”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4],其功能也从最初侧重“分析”转向如今更强调“描述”^[5],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也更为宽泛^[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内卷化概念运用于社会交往和城市融入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有趣的研究发现。例如,汪国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初期人际交往是内卷化的,其特征是社会交往以情感为基础、交往空间狭窄,并且随着交往内卷

收稿日期:2021-06-25

© 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家庭化流动背景下二代流动人口的都市融合与发展研究”(18SHB006)

作者简介:彭大松,社会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

化程度的加深而出现收益递减现象^[7]。无独有偶,刘丽也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有内卷化倾向,他们的交往对象一般只限于亲戚、老乡等熟人,很少与其他外人交往^[8]。由此可见,当用“内卷化”一词来描述社会交往时,多指交往对象的同质性和交往范围的有限性^[9]。围绕农民工社会交往问题,学者们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即农民工社会交往具有内卷化倾向。造成交往内卷化的原因是多维的,但多数研究都指出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化发展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排斥等是主要原因^{[9][10][11][12]}。然而,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落地,年轻一代在城市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与其父辈相比有了很大改善。此外,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因受教育水平更高,掌握网络信息技术更全面,因而比其父辈拥有更强的城市适应能力^[13],这是否意味着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正在扭转社会交往内卷化趋势,进而出现逆内卷化特征?已有研究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拟以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探索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是否随着代际更迭而发生改变,以及哪些因素促使其发生改变。此外,既有研究大多以乡-城流动人口为对象,缺乏对城-城流动人口的关注和比较分析,难以捕捉两类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变动模式的差异,本文则将城-城流动人口同样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

本文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交往视角客观地评价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是否真正使年轻一代流动人口获益。如果社会交往呈现内卷化特征,则不利于个人扩大社会交往圈,阻碍社会资本积累^[13],而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机会和不平等状况^{[7][14]};二是为完善相关公共政策提供有益启示。探讨流动人口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和影响因素,有助于厘清阻碍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内外要素,这对于破除城乡二元发展障碍、促进乡村振兴、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以及城乡融合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社会交往是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定量研究的兴起,社会分层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经济收入和权力等客观指标的分析^{[15][16]},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交往”行为的考察^[17]。社会交往兼具个体与社会双重属性,将其纳入社会分层研究,有助于还原“社会交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真实关系^[18]。布劳尝试用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命题重构社会交往与社会结构理论^[19](P8-9)。他认为,社会结构是由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们占据的位置所构成的,而社会交往则表示社会结构不同位置上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以往对结构和交往之间关系的单向理解不同,布劳认为二者呈现双向关联,即结构反映了个体社会角色、相互关系的位置分布,而社会结构位置分布反过来也影响个体角色定位和社会交往。据此,布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处在相似结构位置上的个体,因其共享角色、经验从而更易于形成社会交往。这个被称为交往的“接近性假说”的命题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婚姻匹配^{[20][21]}、同侪效应^{[22][23]}等研究中都有类似发现。实际上,交往接近性假说在描述社会交往同质化的同时,也反映出阶层差异是“跨层”交往的障碍。社会阶层差异越大,“跨层”交往越难以实现。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类似的交往障碍也普遍存在。经验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受户籍、教育水平、收入、职业类型等因素的影响较大^[24]。社会交往作为社会融入的重要表征,也必然会受其影响^{[7][8][12]}。因此,根据交往的接近性假说和国内相关经验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由于“接近性”优势,城-城流动人口比乡-城流动人口更有可能与城市本地居民交往。

假设2:与正向社会分层相关的要素越占优势,越有可能增加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机会。

具体来说,与正向社会分层有关的要素包括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型、产权住房等。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地位和收入越高且拥有产权住房时,其与城市居民的阶层差异就相应越小,这会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往。反之,教育程度低、从事低端职业、获得低收入等都会扩大个体与城市居民的阶层差异,导致流动人口的交往对象局

限在家人、同乡等亲缘和地缘关系范围内,从而呈现内卷化特征。

(二) 社会网络与社会交往

社会网络理论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交往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点与点的连接代表个体之间的交往,而交往会带来信息的传递与交换,从而有助于改善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格兰诺维特在求职研究中发现,交往所形成的弱连接对于个人求职更有利,因为“弱连接”所传递的信息更少重叠、价值更大,而像亲属、朋友这类“强连接”所负载的信息多是重复的,故而难以提供更为稀缺的求职信息^[25]。此后,林南对“弱关系”假设进行了扩展和修正,并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4]。在林南的理论中,网络结构的不同位置代表着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的多寡,同一阶层的人在资源占有上具有相似性,往往形成“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之间资源相似性很低,往往是“弱关系”。此时,“弱关系”就成为阶层地位低的人连接阶层地位高的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稀缺社会资源^[26]。综合格氏理论和林南的理论可知,社会网络不仅描绘了社会交往中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还解释了“跨层”社会交往的动力机制,即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要想获得更多资源,需要通过与更高网络位置的个体交往来实现。较低阶层“跨层”交往的动力来自于个体的工具性需求^[27]。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交往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社会阶层地位占优一方的手中,他们通过歧视、排斥和其他制度或非制度化途径回避与低阶层个体的交往。最近的研究显示,这种交往倾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增强^[28]。显然,阶层差异扩大所导致的社会交往格局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从社会网络理论看,流动人口能否发展与城市居民的“弱连接”,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个体与本地人交往的主观意愿大小;二是本地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排斥程度。近年来,随着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户籍制度松绑,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甚至安家城市的意愿也日益强烈,这对于推动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增强,能够促进其主动融

入城市^{[13][24]},进而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个体与本地居民交往的主观意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流动人口城市久居意愿越强,越能促进其与本地人交往。相反,流动人口感受到的社会排斥越强,交往越倾向于内卷化。

家庭化流动是当前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家庭化流动极大改善了过去单体流动造成的夫妻分居和亲子分离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改善。家庭化流动不仅增加了流动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将家庭生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24]。这无疑给流动人口参与社区事务、增加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带来更多机会。因为无论是为了适应、融入城市社区,还是为了更好地获得生活机会,家庭化流动都必然会促使个体与本地人交往,从而可能形成“弱连接”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与单体流动相比,家庭化流动更可能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往。

(三) 社会变迁与社会交往的代际差异

虽然目前尚无直接对流动人口社会交往代际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但与之相关的城市适应、城市融入等主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多。多数研究认为,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更能适应和融入城市;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年轻一代流动人口虽然接受了比其父辈更多的教育,但他们对社会排斥和制度隔离也更敏感,从而在城市认同和社会适应上表现得并不比其父辈好^{[13][29]}。这种观点对立彰显出不同世代流动人口从个体特征到面临的外在环境都有很大差异,可能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出现分异。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差异究竟如何?笔者认为,随着代际更迭,流动人口所处的内外制度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经历了从“限制流动”到“自由流动”、从“户籍歧视”到“淡化身份”、从“属地限制”到“平等共享”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过程^{[30][31]}。就此而言,年轻一代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其发展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关系,况且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在教育水平、语言能力以及习得城市生活方式方面比其父辈更有优势。因此,总体而言,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可能比其父辈更适应城市生活,更容易与城市居民形成有效

沟通。据此,我们提出假设5:

假设5:与上一代流动人口相比,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有可能与本地城市居民进行交往。

然而,前述理论表明,社会交往与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有关。因此,社会交往是否会随着代际推移而改变,还取决于子代与父代的相对阶层差异是否发生变化。大量经验证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城乡居民在收入、财富、教育等诸领域的差距不断扩大^[32]。换言之,年轻一代的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市人之间的相对差距比其父辈更大,不利于其进行外向化社会交往,进而表现为社会交往内卷化趋势。据此,我们提出假设6:

假设6:与上一代流动人口相比,年轻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呈现内卷化趋势。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收集了个人和社区两个层面的数据,具有较好代表性,在多个学科研究中都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使用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①,江苏、浙江、上海是“长三角”经济发达省市,也是流动人口最为聚集的区域,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落实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而政策环境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日常生活方式、交往行为密切相关。原数据包括农村和城市样本,本文选取城市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在剔除少量“缺失值”较多的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14107个,其中,上海市样本4447个、江苏省样本5488个、浙江省样本4172个。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交往”。社会交往属于社会行为范畴,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等客观指标相比,该指标具有混合属性,即一方面社会交往受社会结构形塑,具有客观属性;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社会心理反馈行为,具有主观属性。这与布劳将

社会交往界定为“社会结构属性和社会心理前提相结合的结果”^[19](P10-11)基本一致。本文通过被访者对题项“您业余时间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的回答来测度社会交往。答案项为“很少与人来往”(=1)、“与户口在老家的同乡来往”(=2)、“与户口在本地的同乡来往”(=3)、“与其他外地人来往”(=4)、“与其他本地人来往”(=5)。

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来理解“社会交往”。一是从关系向度来理解。中国人的社会交往遵循差序格局,即以个体为中心,依据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构建社会交往网络^[33]。据此可将“社会交往”区分为内向化社会交往和向外化社会交往两种类型。所谓内向化社会交往是指与家人、亲戚、朋友、同乡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基于亲缘、地缘所形成的熟人交往关系。外向化社会交往是指与家人、亲属以及同乡之外的人的交往,是一种与脱离亲缘、地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二是从交往范围和信息重叠向度来理解。内向化社会交往意味着交往范围有限,交往网络所负载的信息重叠度相对较高,这与社会交往内卷化的特征基本一致^{[5][7][8][11]},两个概念从不同侧面描述着相同的社会交往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内卷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通过与某个特定参照对象的比较来判断。以本文为例,以上一代流动人口为参照对象,当下一代流动人口在社会交往上表现出内向化社会交往趋势(交往方向朝向“本人”收缩)时,则为交往内卷化。与内卷化相反的过程是逆内卷化。所谓逆内卷化是指社会交往突破地缘、亲缘关系的局限,向陌生关系延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网络负载信息不断增加的过程。如图1所示,交往内卷化与交往逆内卷化是方向相异的过程。根据本文“社会交往”变量的赋值规则可知,数值越小代表个体越倾向于内卷化交往,数值越大代表个体越倾向于逆内卷化交往。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是代际。代际,也称为世代(generation),是基于年龄划分的不同群体,这些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带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烙印。代际更迭与社会变迁往往具有同步性和相关性,因此,代际比较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对现象的变化过程和变动趋势进行考察^[34]。根据研究

需要,我们按照出生时间将被访对象划分为1969年前出生、1970~1979年出生、1980~1989年出生和1990年及以后出生4个群体。采用此种划分方式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尽量与公众认同的“代际”分类一致,四个代际类别分别代表“60后”^②“70后”“80后”和“90后”;二是不同代际的样本数之间应尽量均衡。



图1 社会交往的内卷化与逆内卷化

本研究其他自变量的测量方式如下。“流动类型”,按照被访者户籍性质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年数”根据被访者受教育程度来测量(未上过小学=1、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处理为连续变量;“收入”以月收入来测量,处理为对数形式;“自购住房”,通过提问“您现在的住房性质”获得,若回答为“自购产权住房”则赋值为1,回答为“租房、借住、其它类型”则赋值为0,做分类变量处理;“职业类别”变量通过“您就业单位的属性”来测量,根据回答项分为4个类别,即党政机关及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生产运输和建筑业、无固定职业(含打零工),在数据处理中做定类变量使用,其中党政机关及专业技术人员为参照类别;“家庭化流动”主要根据家庭信息采集表中的信息来测量,将符合“家庭成员一起流动”,并且“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纳入“家庭化流动”类型,在数据处理时做二分变量处理,以“非家庭化流动”为参照;“流动年数”通过“您本次离开户籍地的时间”来测量,做连续变量使用;“久居意愿”通过询问“您是否打算在此长期居住(5年以上)”测量,答案项分为不打算(=1)、没想好(=2)和打算(=3),做连续变量使用;“排斥感知”是根据“本地人愿意接受我为他们中的一员”和“我感觉本地人总是看不

起外地人”两个问题进行操作化,统一赋值方向后,将两项相加,得分即表示“排斥感知”,数值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社会排斥”越强。

此外,模型还纳入了性别(女=0)、婚姻(未婚=0)、民族(少数民族=0)以及调查省份等控制变量,以降低系数估计偏误。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分布特征。

表1 样本特征描述(n=14107)

变量名称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社会交往	2.39	0.90	1	5
代际(1969年前=0)				
1970~1979年	30%	—	0	1
1980~1989年	41%	—	0	1
1990年后	12%	—	0	1
男性(女=0)	50%	—	0	1
已婚(未婚=0)	74%	—	0	1
汉族(少数民族=0)	98%	—	0	1
家庭化流动(否=0)	64%	—	0	1
流动年数	5.31	4.98	0.33	41
受教育年数	10.56	3.21	1	19
职业类别				
党政机关及专业技术人员	16%	—	0	1
商业服务业	53%	—	0	1
生产、运输建筑业	29%	—	0	1
无固定职业	2%	—	0	1
收入对数(ln)	7.01	2.77	0	11.41
自购住房(无=0)	16%	—	0	1
社会排斥	4.01	1.12	2	8
久居意愿	2.61	0.66	1	3
流动类型(乡-城=0)	24%	—	0	1
省份(市)				
上海	31.5%	—	0	1
江苏	38.9%	—	0	1
浙江	29.6%	—	0	1

注:类别变量用百分比表示,定距变量用均值和标准差表示;表中数据为已经过加权处理后的结果

(三)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文的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进行描述性分析,揭示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变迁趋势;其次,使用回归模型检验世代因素和其它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影响;再次,通过交互分析揭示教育、家庭化流动与代际变量对社会交往的调节效应。由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个人嵌套于社区),适合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来拟合数据。考虑到不同社区内人口构成、收入、阶层等因素差异较大,并有可能对流动人

口个体的社会交往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进行系数估计,以控制社区之间的异质性。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y_{ij} = \sum_{k=1}^n \beta_k X_{kij} + a_j + \varepsilon_{ij}$$

其中, y_{ij} 是因变量,代表第j个社区i个体(流动人口个体)的社会交往测度值; X_{kij} 代表j社区i个体的第k个人变量,包括代际、教育、职业、家庭化流动、收入以及所有控制变量; β_k 是第k个人变量的回归系数; a_j 是固定效应截距,它估计了社区层次未纳入模型的异质性; ε_{ij} 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四、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初步比较全样本、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样本的社会交往代际差异。从表中数据可知:(1)无论被访者属于哪个世代的队列,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乡-城流动人口的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都相对较低,这与以往的经验研究结论基本一致^{[7][34]};(2)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与代际变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说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在不同世代间存在差异性。具体来说,与1960年代及此前出生的一代人相比,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人逆内卷化社会交往趋势明显,但“1990年后”出生的一代社会交往又呈现出内卷化倾向(图2)。由于没有控制其它变量,表2中的数据 and 图2中曲线的变化趋势只适合用于进行初步判断,要得出更确切的结论,有待下文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做进一步验证。

(二)统计模型分析

1. 流动人口交往模式的代际差异

表3是纳入了代际和其它自变量、控制变量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是全样本模型,模型2和模型3分别是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样本模型。从模型1结果可知,与“60后”流动人口相比,“70后”和“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没有显著性变化,但“80后”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

交往水平显著提高,从而表现为逆内卷化趋势。由此可见,全样本分析结果支持了图2的变化趋势。在模型1中,我们也观察到城-城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显著地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这证实了表2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也支持了假设1。

表2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代际	全样本	乡-城流动	城-城流动
1969年前	2.69(1.33)	2.61(1.27)	3.05(1.52)
1970-1979年	2.82(1.34)	2.71(1.28)	3.19(1.46)
1980-1989年	2.96(1.34)	2.79(1.26)	3.35(1.43)
1990年后	2.78(1.26)	2.71(1.22)	3.30(1.42)
合计	2.85(1.33)	2.72(1.27)	3.25(1.46)
F-value	33.01	12.30	8.74
Prob>F	0.000	0.000	0.000
N	14107	10101	4006

注:表中数值为均值,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已加权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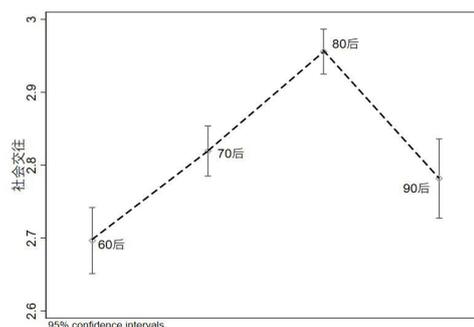


图2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变迁趋势

进一步比较乡-城流动人口模型(模型2)和城-城流动人口模型(模型3),我们发现,两者在代际变量上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乡-城流动人口模型中,“80后”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显著高于“60后”一代,社会交往的逆内卷化趋势明显。城-城流动人口模型中,“80后”社会交往效应系数虽然为正,但未通过统计检验,而“90后”的社会交往则出现了显著的逆内卷化趋势。对两个模型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可知,乡-城流动人口在“90后”一代身上出现了明显的交往内卷化现象。与此不同,城-城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总体上呈现代际递增趋势,尤其到“90后”一代,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已显著高于前几代人。由此可见,对于城-城流动人口而言,假设5成立,即流动人口

外向化交往在更年轻一代中呈现增强趋势。而对于乡-城流动人口,则假设6得到验证,即更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因城乡差距扩大而出现明显的交往内卷化趋势。引发两类流动人口交往模式差异的可能原因将在交互分析中做进一步讨论。

表3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代际差异的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全样本)	模型2(乡-城)	模型3(城-城)
代际(1969年前=0)			
1970-1979年	0.04(0.03)	0.03(0.03)	0.06(0.07)
1980-1989年	0.09*** (0.03)	0.07*(0.03)	0.11(0.08)
1990年后	0.04(0.05)	-0.06*(0.03)	0.24** (0.13)
男性(女=0)	-0.02(0.02)	-0.01(0.02)	-0.04(0.05)
已婚(未婚=0)	-0.11** (0.03)	-0.14** (0.04)	-0.18** (0.07)
汉族(少数民族=0)	0.13*(0.07)	0.14(0.08)	0.25*(0.13)
家庭化流动(否=0)	-0.06** (0.03)	-0.10** (0.02)	0.04(0.07)
流动年数	0.013*** (0.002)	0.011*** (0.002)	0.021*** (0.005)
受教育年数	0.05*** (0.004)	0.05*** (0.005)	0.07** (0.01)
职业(党政机关及专技=0)			
商业服务业	-0.09** (0.03)	0.04(0.04)	-0.11** (0.06)
生产、运输建筑业	-0.23*** (0.04)	-0.20*** (0.05)	-0.17** (0.07)
无固定职业	-0.18** (0.07)	-0.25** (0.08)	-0.06*(0.05)
收入对数(ln)	0.09** (0.02)	0.06** (0.02)	0.15** (0.03)
自购住房(无=0)	0.23*** (0.04)	0.24*** (0.05)	0.20*** (0.06)
社会排斥	-0.08** (0.01)	-0.07** (0.01)	-0.13** (0.02)
久住意愿	0.11** (0.02)	0.07** (0.02)	0.19** (0.04)
流动类型(乡-城=0)			
省、市(上海=0)			
江苏	0.11*(0.05)	0.12** (0.03)	0.25** (0.08)
浙江	0.001(0.05)	0.01(0.03)	0.11(0.09)
常数项	1.53*** (0.17)	1.85*** (0.19)	0.66** (0.36)
对数似然值	-26233.7	-19620.5	-6657.9
样本量	14107	10101	4006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p<0.1,*p<0.05,**p<0.01,

***p<0.001

2.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

表3除了估计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效应外,还报告了其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以模型1来说,教育程度、职业、自购住房、收入等表征个人资源、财产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对流动人口外向型交往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2得到证实。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多接受1年教育,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能平均提高0.05。类似地,月收入对数每提高1个单位,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平均提高0.09。从职业来说,与国家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商业服务业从业者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平均下降0.09,生产、运输、建筑业从业者平均下降0.23,无固定职业者平均下降0.18。换言之,越是从事低端职业的流动者,越有可能形成内

卷化的社会交往格局。此外,拥有自购产权住房对社会交往也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拥有产权住房、成为城市社区业主,大大提高了流动人口对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从而促进其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类似的效应还在“社会排斥”和“久住意愿”两个变量上有所体现,前者显著降低了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后者则显著促进了外向化社会交往,两者都反映出主观心理因素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假设3得到证实。另外,“流动年数”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人流动在外的时间越长,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越高,社会交往内卷化程度就相应越低。这与汪国华的研究结论一致,该研究认为交往行为是流动人口适应城市文化的突破口,新生代农民工将经历从初期的内卷化交往逐渐过渡到理性化和匿名化的外向化社会交往的过程^[7]。

此外,家庭化流动对社会交往的作用在模型2和模型3中并不一致:对乡-城流动人口而言,家庭化流动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城-城流动人口的影响却不显著,假设4未得到证实。笔者认为,社会交往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双重特征。从情感满足角度来说,人们更愿意与家庭成员交往,因为这是情感满足需要最容易实现的方式;从交往的工具性需求来看,个体也需要借助外向化社会交往来建立“弱关系”,以便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和生活机会。由此可见,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能会加速个体社会交往的内卷化,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个体努力实现逆内卷化的社会交往。因此,实现逆内卷化交往中面临的阻力大小将决定个体社会交往的现实流向。具体来说,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乡-城流动人口总体上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结构位置上,逆内卷化社会交往面临更大阻力^[28]。因此,虽然同为家庭化流动类型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成员,而城-城流动人口则更可能表现出混合式交往。这一结论也说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不仅取决于自身社会阶层结构和主观意愿,还取决于社会交往壁垒的高低,对于低社会地位的流动人口而言,要实现逆内卷化社会交往仍面临重重困难。

3. 教育、家庭化流动与代际交互效应

(1) 教育的调节效应

表 4 在表 3 基础上纳入教育与代际交互项,分别形成模型 4(全模型)、模型 5(乡-城模型)和模型 6(城-城模型)。其中,模型 4 显示,教育与代际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在这一点上,模型 5 与全模型几乎一致,这表明,对乡-城流动人口来说,教育对社会交往的正向影响呈逐代增强趋势。模型 6 显示,城-城流动人口中只有“90 后”一代与教育变量的交互项有统计显著性,而“70 后”与“80 后”两代人与教育的交互项系数为不显著的负值。这说明,与“60 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70 后”和“80 后”城-城流动人口的教育促进作用在下降,进而使得两类流动人口的教育调节效应存在差异。

表 4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教育与代际交互效应估计

变量名称	模型 4(全样本)	模型 5(乡-城)	模型 6(城-城)
代际(1969 年前=0)			
1970-1979 年	0.07 ^{***} (0.03)	0.10 ^{***} (0.04)	0.10(0.07)
1980-1989 年	0.12 ^{***} (0.03)	0.15 ^{***} (0.04)	0.12(0.08)
1990 年后	0.06 (0.05)	0.06(0.05)	0.19(0.15)
受教育年数	0.04 ^{***} (0.007)	0.023 ^{***} (0.009)	0.09 ^{***} (0.02)
教育×代际			
1970-1979 年×教育年数	0.02 ^{***} (0.009)	0.03 ^{***} (0.01)	-0.02(0.02)
1980-1989 年×教育年数	0.02 ^{***} (0.009)	0.02 ^{***} (0.01)	-0.01(0.04)
1990 年后 × 教育年数	0.04 ^{***} (0.016)	0.05 ^{***} (0.02)	0.02 ^{***} (0.01)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常数项	2.02 ^{***} (0.18)	2.27 ^{***} (0.20)	0.50 ^{***} (0.38)
对数似然值	-26240.8	-19626.2	-6665.1
样本量	14107	10101	400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5,** p<0.01,*** p<0.001;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民族、家庭化流动、职业、收入对数、自购住房、久住意愿、社会排斥、流动类型、调查省市

为了进一步说明教育的调节效应差异,我们用图形的方式比较了交互项中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值变化情况。图 3 呈现了交互项边际效应变化差异,左图代表乡-城流动人口,右图代表城-城流动人口。图中各条直线代表着不同代际流动人口与教育的交互效应,直线的斜率为正表示交互效应为正向作用,斜率为负表示交互效应为负向作用^③。从图 3 中可以看到,乡-城流动人口的交互效应为正,城-城流动人口的交互效应只在“90 后”一代身上表现出正向效应,而“70 后”和“80 后”教育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这进一步佐证了前文分析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边际效应是指平均边际效应,是假定总体均质情况下的处理效应,而实际

人口并非均质性总体。当相同教育程度的人分属不同代际类别时,教育程度对社会交往的作用大不相同。以乡-城流动人口为例,图 3 中 3 条直线交点所对应的受教育年数为 15 年(教育程度相当于大专),以此为界,对受教育年数小于 15 的个体而言,相同教育程度对应的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随着代际的变化而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中,“90 后”低于“70 后”和“80 后”。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10.2 年,而乡-城流动人口受教育年数可能远低于这个数字。这就意味着,低学历的乡-城流动人口中“90 后”一代对应着更低的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从而在代际变迁中表现出社会交往的内卷化倾向。而城-城流动人口的情况却相反,3 条线交点对应的教育年数为 9 年,与乡-城流动人口相比,城-城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时间小于 9 年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大于 9 年的比例较高。因而,大多数城-城流动人口所对应的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高于“60 后”一代(y=0),且“90 后”高于“80 后”和“70 后”,从而使得城-城流动人口在外向型社会交往上表现出明显的代际递增趋势。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前文所发现的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征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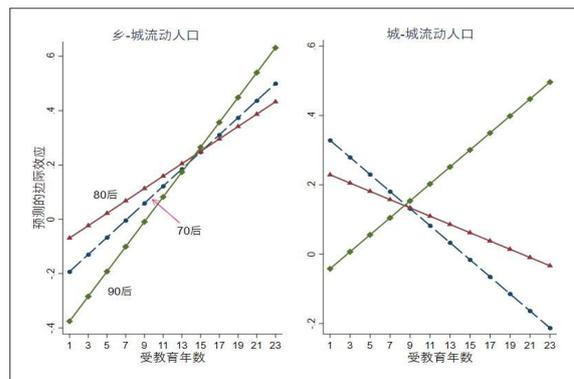


图 3 乡-城与城-城流动人口的教育与代际交互项边际效应比较

注:作为参照,“1969 年及之前出生”的一代人对应 y=0,且平行于 x 轴的平行线

(2)家庭化流动的调节效应

表 5 报告了家庭化流动与代际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模型 7 是全样本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8 和模型 9 分别是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人口的估计结

果。乡-城模型估计结果与全模型估计结果比较一致,但与城-城流动人口模型估计结果有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对于乡-城流动人口来说,家庭化流动对外向化社会交往的负向作用随着代际推移有逐渐增强趋势,尤其是对“90后”一代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而对于城-城流动人口来说,家庭化流动几乎没有任何负向影响,这与前文无交互项模型估计结果保持一致。为直观起见,我们将家庭化流动对两类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边际效应呈现于图4。图4上半部分是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受家庭化流动影响的边际效应,所有世代的均值都小于0,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尤其“90后”一代下降幅度较大。图4下半部分是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受家庭化流动影响的边际效应,其中“70后”“80后”和“90后”边际效应都为正,且变动幅度不大。图形直观地反映了两类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受“家庭化流动”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表5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家庭化流动与

代际交互效应估计

变量名称	模型7(全样本)	模型8(乡-城)	模型9(城-城)
代际(1969年前=0)			
1970~1979年	0.04(0.06)	0.05(0.06)	0.07(0.07)
1970~1979年	0.11 ^{**} (0.05)	0.13 ^{**} (0.05)	0.03(0.08)
1990年后	0.09(0.06)	0.07(0.06)	0.16(0.15)
家庭化流动(否=0)	-0.03(0.05)	-0.03(0.05)	-0.08(0.13)
家庭化流动×代际			
1970~1979年×家庭化流动	-0.002(0.06)	-0.02(0.07)	0.18(0.16)
1980~1989年×家庭化流动	-0.03(0.06)	-0.06(0.07)	0.11(0.14)
1990年后×家庭化流动	-0.19 ^{**} (0.09)	-0.21 ^{**} (0.09)	0.10(0.28)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常数项	1.49 ^{**} (0.17)	1.81 ^{**} (0.20)	0.73 [*] (0.37)
对数似然值	-26236.4	-19623.1	-6660.0
样本量	14107	10101	400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5,** p<0.01,*** p<0.001;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民族、受教育年数、职业、收入对数、自购住房、久住意愿、社会排斥、流动类型、调查省市

由于前文已经对“家庭化流动”影响两类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的差异做出解释,在此不再赘述。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两点:其一,家庭化流动对“90后”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城-城流动人口却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也是造成乡-城与城-城两类流动人口外向型社会交往代际变迁模式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其二,家庭化流动对

“90后”乡-城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的负向影响加剧,从而导致了交往内卷化倾向,这需要引起学界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随着举家流动越来越普遍,年轻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越发趋于内卷化,从而间接地导致累积性社会资本缺失和生活机会减少,甚至成为进一步扩大城乡年轻群体之间社会差距的主要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实际上,西方学者在研究移民融合时也有类似的发现。西方学者早期研究认为,第一代移民以接受迁入地文化的融入模式为主,并形成一致性文化认同(即“熔炉论”)。但后续对二代移民融入的研究却发现,更年轻的二代移民只是部分地接受迁入地文化,同时还保留了部分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所谓的区隔融合或马赛克式融合^[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移民融入研究主要是针对不同种族或者跨文化移民的文化认同而得出上述结论,这与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现实有很大差异。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障碍主要在于乡城的阶层差异和制度藩篱,文化并非主要障碍^[24]。因此,笔者认为,造成我国“90后”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制度性屏障以及城乡居民的阶层差异有关。近年来相关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异、教育差异、消费差异乃至社会阶层差异都出现了扩大化趋势^{[35][36][37][38]},也间接地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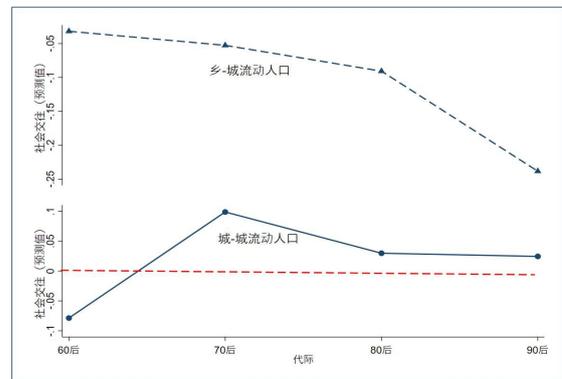


图4 家庭化流动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边际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交往一度是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议题,

随着社会学理论的演化与发展,“社会交往”渐渐远离了理论的中心地位,成为诸多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个维度。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交往成为构建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在社会信任理论中,社会交往是测度信任的主要指标;在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交往是网络链接的基本形式;在社会融合理论中,社会交往则是深度社会融合的重要表征。不管社会交往以何种形式出现在研究中,它总能成为勾连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的重要方式。换言之,社会交往不仅仅代表个人行为,还往往折射出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和形塑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文探讨了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特征及其异质性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究竟是趋向内卷化,还是逆内卷化?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从整体上看,与“60后”相比,“70后”和“80后”流动人口的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显著提高,但“90后”外向型交往有所下降。进一步比较乡-城和城-城两种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后发现,“90后”外向化社会交往水平下降主要体现于乡-城流动人口之中,而城-城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程度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显示了比以往几代更高的水平。由此说明,社会交往的代际效应在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之间出现了分异,即随着代际推移,年轻一代的“90后”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呈现了明显的内卷化趋势,而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则呈现出逆内卷化特征。

2.在影响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程度、职业、自购住房、收入等代表个人资源、财富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教育程度低、职业位置靠近底层、无自购住房和收入水平低的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更可能内卷化。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究竟是内卷化还是逆内卷化,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密切相关,越是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越容易出现社会交往内卷化倾向,这充分说明了社会结构对个体交往行为的约束和塑造作用。

3.社会交往具有情感性和工具性双重功能。一

方面,流动人口远离熟悉的亲友网络,到陌生的城市生活,需要重建社会交往网络,以弥补情感性交往的缺失;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更需要通过与他人交往,建立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机会。因而,流动人口要建立外向型社会交往网络,除了流动者本人需要发挥积极主动性之外,还取决于外部环境特征。在包容性更好的交往空间中,可以轻易实现逆内卷化交往,但在交往存在障碍和阶层壁垒高筑的交往空间中,社会交往会出现内卷。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个体感知的社会排斥越强,外向化交往水平越低;而个体城市居留意愿越大,越有可能实现逆内卷化交往,这充分表明了个体交往行为与外部交往空间的互动关系。

4.家庭化流动对社会交往产生一定影响。对于乡-城流动人口而言,家庭化流动人口并未因为家庭成员在流入地生活而增加与本地人的互动交往,反而出现了交往内卷化趋势。而作为对比,在城-城流动人口身上并未发现家庭化流动带来的负向影响。这种差异与两类人口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不同有关,乡-城流动者更靠近社会阶层结构底部,其逆内卷化社会交往面临更大的障碍,而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社会阶层更为接近,因而发展出外向型社会交往的障碍要小得多。由于两类人口面临的社会交往环境不同,最终导致了两者在家庭化流动影响效应上的差异。这一结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同质性”原则以及社会交往与社会结构理论中的“接近性”假设基本一致,即相同阶层的人更容易形成社交网络,而跨越阶层的社交相对困难^[4]。乡-城流动人口在发展外向型社会交往面临阻力的时候,被迫将社会交往范围收缩于家庭内成员之间,从而使得家庭化流动对乡-城流动人口外向化社会交往表出现显著的负向作用。

5.交互效应分析揭示,教育和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具有调节效应,且调节效应在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中存在差异。从教育来说,教育对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正向调节效应呈现代际递增趋势,而对城-城流动人口的正向调节效应只在“90后”一代身上具有显著性。从家庭化流动来看,家庭化流动对社会交往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90后”乡-城流动人口身上,而对城-城流动

人口没有影响。交互效应结果差异可能是造成两类流动人口社会交往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

总之,社会交往是个体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迁徙已成为常态,研究流动人口社会交往代际流向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结构对个体社会交往行为的塑造机制,以社会交往为观景之窗,洞悉社会发展之于不同社会结构位置上个体命运的不同意义。换言之,如果社会交往代表更多的生活机会,那么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内卷化趋势显然不利于公平发展,也有悖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值得学界和政府高度重视。

注:

- ① 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支持,具体抽样过程和技术细节请参考《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技术手册》。
- ② 1969年前出生的一代人中比例最多的是“60后”。这主要是因为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对象的年龄上限是60岁,而50年代出生的人数较少,不宜单独分为一类,并且考虑到“50后”与“60后”成长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故而全部归类到“60后”队列。
- ③ 两个图中直线均以1969年前出生的一代为参照,即以 $y=0$ 的直线为参照。

参考文献:

- [1]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96-110.
- [2]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J]. Population Studies, 1965, 18(3): 599-600.
- [3] (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2.
- [4] 周大鸣, 郭永平. 谱系追溯与方法反思——以“内卷化”为考察对象[J]. 世界民族, 2014, (2): 9-15.
- [5] 张岳.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吗?——基于对“内卷化”概念比较性的理解[J]. 天府新论, 2020, (1): 88-95.
- [6] 李祖佩. 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 (6): 116-129.
- [7] 汪国华. 从内卷化到外延化: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地创业社会支持网络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8): 56-61.
- [8] 刘丽.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J]. 河北学刊, 2012, (4): 118-122.
- [9] 叶鹏飞. 探索农民工城市融合之路——基于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 81-85.
- [10] 肖云, 邓睿.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 36-45.
- [11] 吴业苗. 从“农业内卷化”到“打工内卷化”: 人的城镇化困境与诉求[J]. 河北学刊, 2016, (5): 186-191.
- [12] 康红梅. 社会排斥背景下底层群体“内卷化”职业身份认同研究——以环卫农民工为例[J]. 理论月刊, 2016, (1): 143-148.
- [13] 杨菊华.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 (4): 119-128.
- [14]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16.
- [15] Blau P.M., Duncan O.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8, 33(2): 296-297.
- [16] Featherman D L., Jones F L., Hauser R M. 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75, 4(4): 329-360.
- [17] 刘精明, 李路路. 阶层化: 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5, (3): 52-81.
- [18] Erikson R., Goldthorpe J.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217-219.
- [19] (美)彼特·布劳. 不平等和异质性[M]. 王春光, 谢圣赞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20] Kalmijn, M. Inter-marriage and Homogamy: Causes, Patterns, Trend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395-421.
- [21] 张翼. 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4): 43-51.
- [22] Zimmer R W., Toma, E F. Peer Effects in Private and Public Schools across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00, 19(1): 75-92.
- [23] 焦媛媛, 李智慧. 同侪影响的内涵、产生机理及其在管理学中的研究展望——基于社交网络情境[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1): 213-224.
- [24] 彭大松, 苗国. 家庭化流动背景下非户籍人口的社区参与研究——基于广义分层线性模型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20, (5): 62-72.
- [25]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26]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206.
- [27] 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J].人文杂志,2013,(1):107-113.
- [28] 田丰,付宇.无友不如己者:城镇化如何影响个人社会资本[J].社会学评论,2020,(5):74-87.
- [29] 汤兆云.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代际比较——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6,(9):82-87.
- [30] 刘小敏,蔡婷玉.社会变迁视域内的中国人口流动:60年回顾与思考[J].江海学刊,2009,(5):27-32.
- [31] 梁土坤.居住证制度、生命历程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基于2017年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1):96-109+172-173.
- [32] 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管理世界,2018,(12):19-28.
- [3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30.
- [34] 沈杰.青年、世代与社会变迁:世代理论的源起和演进[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3):1-7.
- [35]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 [36] 任文龙,张苏缘,陈鑫.金融发展、收入水平与居民文化消费——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9,(11):118-127.
- [37] 黄超.收入、资产与当代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J].社会学研究,2020,(2):195-218+245-246.
- [38] 尚进云,王振振.家庭背景、大学文凭与职业阶层地位获得的城乡差异——基于EGP职业阶层分类的新观察[J].复旦教育论坛,2020,(5):79-85.

【责任编辑:龚紫钰】

Involution and Inverse Involution: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in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PENG Da-song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210042)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unanimously believed that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s involuted, and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is limited to acquaintance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relatives, and countryma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migrant,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reverse trend of involu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s Survey (CMDS) data and applied the fixed-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trend of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migrants, rural-urban and urban-urban. The study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ost-60s” migrant population, the “post-90s” migrant population’s social interactions tend to be involution, while the “post-70s” and “post-80s” migrant population shows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inverse involution. In other words, social interaction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geography and kinship, and extends to unfamiliar relationships, in which the scope of communication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information loading on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involu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post-90s” migrant population mainly occurs in the rural-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The urban-to-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not only has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volution, but also has a tendency to inverse-involu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lower class status is more prone to involu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Education and family-migration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is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igrant population. The social intercourse involu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dicates that life opportunities will decrease and inequality will deepen, which should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Key words: migrant popul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involution; inverse involuti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